

第4卷

刘增杰 著

战火中的缪斯

河南大学出版社

战火中的缪斯

刘增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第 09 号

19—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

第四卷

战火中的缪斯

刘增杰 著

责任编辑 宋应离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200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5.00元

ISBN 7-81018-767-8/I·62

目 录

第一章 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路向	(1)
一 历史回顾:救亡文学思潮的孕育	(1)
二 战争改变着一切	(3)
三 搅乱了文学秩序	(6)
四 审美心理嬗变:文学观念的倾斜	(9)
五 文学路向的新调整:走向文学形态的多样化 ..	(15)
六 抗战胜利与文学思潮发展的新动向	(20)
第二章 工农兵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现实主义主潮之一	(31)
一 从苏区文学到工农兵文学	(31)
二 发展路径	(34)
三 独特的审美品格	(41)
四 作家群扫描	(45)
五 挑战与互补:王实味等人文学观透视	(58)
第三章 独树一帜的七月派文学	
——现实主义主潮之二	(74)
一 从《七月》到《希望》:七月派文学发展轨迹 ..	(74)
二 胡风与七月派	(78)
三 七月派的理论品格	(83)
四 创作实践:描摹“一代的心理动态”	(93)
五 贡献与局限	(97)
第四章 历史剧创作潮:特定时空下的文学景观	
——现实主义王朝之三	(103)

一	一股奔突而出的文学新潮	(103)
二	创作热点:庄严时刻的理性思考	(105)
三	总体美学风貌:崇高的悲剧美	(110)
四	对于一种观点的辨析与补充	(113)
第五章 讽刺、暴露文学的崛起		
	——现实主义主潮之四	(117)
一	抗日文坛的新趋向	(117)
二	讽刺、暴露文学的美学特征	(121)
第六章 反思文学的勃兴		
	——现实主义主潮之五	(125)
一	强烈的感情反差:反思文学的抬头	(125)
二	反思文学:深邃的创作主题	(129)
三	反思文学的价值取向及其终结	(136)
第七章 《围城》与反思文学		
一	历史提供的一种文学选择	(141)
二	反思的独特性	(144)
三	《围城》与现代主义	(147)
第八章 浪漫主义的历史命运		
一	历史的偏执:关于浪漫主义的一些理解	(153)
二	创作一瞥	(155)
第九章 中国新诗派的悄然行进		
一	从《诗创造》到《中国新诗》: 一个现代派诗群的崛起	(162)
二	中国新诗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	(164)
三	共同创作倾向与独创的个人艺术风格的统一	(176)
四	时代精神与历史的超越	(179)

第十章 民族文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185)
一 “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的鼓荡者	(185)
二 一种有害的创作倾向	(189)
三 三民主义文艺思潮的末路	(192)
第十一章 沦陷区文学思潮的走向	(196)
一 沦陷区文学的类型	(196)
二 救亡文学思潮发展的独特形态	(197)
三 一种新的创作倾向的探寻	(203)
四 殖民文学和汉奸文学一瞥	(205)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文学思潮与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思潮	(208)
一 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思潮: 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	(208)
二 文学上的双向运动:“出国”与“进口”	(214)
参考书刊目录	(218)
一 主要参考书目	(218)
二 主要参考期刊目录	(220)
附录	(226)
时代大潮与小说形态 ——20世纪中国小说管窥	(226)
一种值得思考的批评趋势 ——论解放区文学思潮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236)
铁塔下的情思(代后记)	(247)

第一章 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路向

救亡文学思潮的孕育——战争改变着一切——搅乱了文学秩序——审美心理嬗变：文学观念的倾斜——民族意识的张扬——文学教化功能的强化——文学路向的新调整：在现实主义主潮下走向多元的文学形态——抗战胜利与文学思潮发展的新动向——“右倾”论辨析

一 历史回顾：救亡文学思潮的孕育

救亡文学是文学在近代中国种族冲突中的历史抉择。

在近代中国，救亡文学思潮和救亡社会思潮同步发展。救亡社会思潮催促着救亡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救亡文学思潮的发展，又为救亡社会思潮推波助澜。中国抗战文学具有中国近代救亡文学的鲜明特色，是中国近代救亡文学思潮的承继与发展。

19世纪初，随着鸦片像海潮般地输入中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也日益加深，民族危亡的巨大阴影开始笼罩整个中华大地。适应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双重任务的历史要求，救亡文学思潮应运而生。鸦片战争前夕和鸦片战争时期诞生的爱国诗歌和散文，愤怒谴责英国侵略者的罪行，热烈歌颂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唱出了近代救亡文学的第一曲战歌。在反侵略

战争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林则徐，在受到拥掌朝政大权的投降派的迫害、谪戍伊犁时，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感人诗句，显示了中国近代作家以民族救亡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形成了近代救亡文学的宝贵传统。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救亡文学思潮逐渐发展为较为完整的文学形态，作品数量之多，内容的深刻广泛，都为鸦片战争时期所罕见。五四文学诞生于中国蒙受新的民族屈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浓重的救亡色彩浸染于大量的反封建作品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社会思潮和救亡文学思潮更成为普遍的时代情绪和文学心理。正如鲁迅所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因此，当前应该将一切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去，“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①。从19世纪初起，帝国主义接二连三侵略带来的民族灾难，反动统治者在侵略者面前的卑躬屈膝，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一连串的民族屈辱，政治重压下人们的愤怒与悔恨交织的民族感情，日益化为民族救亡的能量。这能量一天一天地在累积、凝结、涌动，就象火山爆发之前岩浆在地下的突奔。芦沟桥抗战的枪声，终于成为民族救亡情绪大爆发的突破口。共同的爱国主义热情，淡化了社会原有阶级之间的隔阂，减少了作家之间的分歧，也吞没了一些作家固有的创作小天地，迎来了救亡文学思潮的新高涨。

^①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475、476页。

二 战争改变着一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国芦沟桥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切,一些人还把它看作是日军挑起的一次屡见不鲜的军事挑衅事件。当时的中国报纸,也仅用“芦沟桥中日军冲突,日军猛烈进攻我军沉着应付,迄昨夜止双方交涉尚无结果”^①这一类的题目作为一次普通的军事冲突,加以报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继平津失陷,上海“八·一三”战事又起,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时代。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侵略者毁灭中国文化的罪行: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这种破坏人类和平幸福和摧残人类文化的强盗,却不仅要毁灭我们这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伟大民族,而且也正在以完全不顾惜的一切野蛮手段,进行毁灭我们这伟大民族的文化。凡是日寇的炮火所到,日寇的铁蹄所到,不仅我们那里的男女同胞,或万、或千、或百、或无数的生命,横遭惨酷无伦的毁灭、屠杀和奸淫;不仅我们那里的财富,我们那里数千年来由我们祖宗和我们这一辈同胞所血汗经营而来的产业横遭惨酷无伦的毁灭、洗劫和抢掠;而且我们那里的文化,不管旧的或新的都横遭惨酷无伦的毁灭,都为之一荡然无存。北平——这是我们数百年来人文荟萃的故都,那里有我们文化的精英,那里是我们戊戌维新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那里是我们近代几次文化启蒙运动的发源地,那里在数十年来曾培养出无数从事唤醒国魂的全国青年学子,那里曾培养出无数的近代中国之政治的、经

^① 1937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

济的、科学的、文艺的人才，为近代中国文明吐出奇葩，……然而这个中国的，东方的乃至世界的古代文化圣地，自去年八月以来，是沉沦在日本强盗的炮火铁蹄之下了！学府变成了日寇的兵营；万千学子和优秀的文化人士从那里逃亡出来，失学、失业和流浪；百年来新文化的文献，革命的文献，被迫于数日之内焚烧殆尽；所有的国宝，所有的最宝贵的古代文物都被日本强盗劫走而去；而在北方久著声名且为北方最高学府之一的天津南开大学，在日寇炮火下，转瞬间已化为焦土。上海——这是我们中国近代经济的文化的中心，那里有许多最高学府，那里不断地集合了全国最优秀的文化界人士，从事文化的工作；那里有全国历史最大最大的报纸，那里有许多全国最大的印书馆，印刷供给全国文化食粮的近代学校教科书，近代科学文献，那里时常有唤醒国魂、反映时代脉搏〔搏〕，而为全国万流共仰的刊物杂志，那里曾有世界闻名的东方图书馆；可是一二八的战争，由于日寇摧残文化的暴行，已使上海的文化事业遭受了历史上第一次的浩劫。而八一三以来，日寇更变本加厉，在日寇炮火之下，所有学府，所有文化机关，都相继随天津南开大学的命运而化为焦土，即在租界以内的，也难幸免。……①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冲突。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激怒了我国各阶级、各阶层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抵抗侵略、一致对外的民族呼喊声，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芦沟桥事变，把整个中国投进巨大的政治骚动之中，促使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促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自觉地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贡献力量。为保卫民族文化而献身。

这是全世界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的冲突。如果说 1935 年阿比西尼亚人民对意大利的侵略者的抵抗、1936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德

①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载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册第 12—1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意侵略者的英勇战争，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那么，自芦沟桥事变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战争给中国作家带来的心灵上的震颤是空前的。这里摘录的是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时反映当时中国作家心态的一些言论：

茅盾指出：在这有炮火，有血，有痛苦，有悲剧的大时代，作家要“站在各自的岗位”，“用血淋淋的奋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①

巴金说，我们不仅要“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来洗去这耻辱。”^②

萧乾提出：“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他回答说，“我们能做的太多了。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③

黎烈文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我们与其被人奴辱，我们宁愿化为白骨，我们的土地与其被人劫占，我们宁愿使它变成瓦砾！”^④

胡风认为，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这是每个中国人“做正经事的机会”。他还说，“不要爱惜在奴隶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贪恋瓦上霜一样的个人的‘事业’，更不要记住什么狗屁‘地位’，把一切后事交给幼小的我们底子弟，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难得有的机会吧！”^⑤

“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难得的机会”，把自己的全身心贡献给民族解放事业，这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作家的共同心理趋向。

① 《站在各自的岗位》，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② 《一点感想》，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③ 《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④ 《伟大的抗战》，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⑤ 《做正经事的机会》，1937年《呐喊》创刊号。

三 搅乱了文学秩序

战争改变着一切。战争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搅乱了
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固有秩序。这主要表现在：

(一)文学队伍的新组合。侵略者攻城掠地的炮火在辽阔中华大地上的肆虐，逼迫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所有中国人作出抉择。随着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学队伍也迅速地进行着新的集结。30年代前期、中期因不同政治倾向，不同艺术派别而反目的作家、艺术家，开始从分裂走向统一，不约而同地集合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中国作家就在隆隆的炮声中，发出了悲壮的“呐喊”，创刊《呐喊》杂志，宣布“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要求作家“站在各自的岗位”，和全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①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抗日救亡文学团体纷纷建立，出现了各派作家大联合的明显趋势。

1938年初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显示了文艺界大联合新阶段的开始，正如成立宣言所说：“过去中国戏剧界也和其他文化部门一样，有着种种政治的，职业的，地域的分派，甚至同一团体之间仍不免有无原则的纠纷和隔阂，常常会使我们宝贵的精力浪费在第二义的斗争”。宣言指出，在大敌当前的情势下，“我们岂能再有任何门户之见？派别之争？在敌人眼中，京派海派同为亡国之音；在朝在野同在屠杀之列。因此，我们不能不要求我国有血性有觉悟的戏剧界人士，捐除一切成见，巩固这一超派系超职业超地域的团结”。^②稍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又宣告成

^① 《呐喊》创刊献词，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②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抗战戏剧》1938年1月第1卷第4期。

立,全国文艺界大团结的局面初步形成。

(二)文化中心的转移与作家生活的新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前,拥有大批作家和读者的北平、上海,形成了中国两个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北平、上海沦陷后,武汉和广州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及至武汉、广州又相继沦陷,经过了作家的逃难、迁徙、流亡,一些战时的文化中心又逐渐建立,正如一位作者所云:“毁灭了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文化中心”,“建立起了无数新兴的文化堡垒”。^① 这些新的文化堡垒,遍布于全国广大地区。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延安、西安、福建永安、乃至香港、上海“孤岛”、华北敌后,都各自拥有一批作家,或直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或致力于文学创作。

文化中心的转移和作家生活的变化,对于30年代后期和整个40年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出现,打破了五四以来文化只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的格局,开拓了文化发展的广阔天地,促进了文化与更多读者的真正接近。新的读者群的出现,直接影响着文学新的美学风格的追求与形成。

第二,战争使作家踏上了长长的旅路。追踪战时作家的足迹,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纵横交错、前所未有的流亡图。在旅途中,他们看到了烽火,听到了炮声,闻到了血腥,经历了苦难。作家旧的生活秩序的破坏,新的生活秩序的建立,意味着作家“很自然地离开了狭隘单纯的所谓‘作家群’底生活,而开始实践了‘和大众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底改变,作品的取材范围也就有了新的展开——他们不必再以‘想像’和‘回忆’为题材的主要源泉,而可以拿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万千大众底现实生活)为写作的根据”,^② 从而给文学创作开辟了与30年代前期、中期迥然不同的前景。胡风

① 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艺阵地》1938年5月第1卷第2期。

② 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艺阵地》1938年5月第1卷第2期。

对此也曾作过相当概括的论述：“民族革命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这以前，作家底世界是书斋，是客厅，是教室，是亭子间，是地下室……，但炮声一响，这些全都受到了震动，门窗颤抖，积尘飞扬，他们兴奋地，或者想镇静而不得地跑了出来，向愿意去的或能够去的各种各样的领域分散。跑向热情洋溢的民众团体，跑向战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而且还得经过虽然困苦但生活形象却纷至沓来的，长长的旅路。”^①郭沫若对抗战前后因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创作风貌的改变，更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抗战对中国的文艺界起了一番净化的作用，这也是很可宝贵的战果。中国的新旧文艺，在抗战前可以说都是和生活现实脱了节，旧的文艺局限于古代作品的摹拟，老早失去了它的生命。新的文艺也局限于外国作品的摹拟，还是一些纸糊泥塑玩具。新旧的作家们同样也和生活现实脱了节，它们不是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少数近代化了了的都市，便是锢闭在书斋画室里保守着自己的“象牙之塔”。无论新旧左右，一律都是高蹈，一律都在卖弄玄虚。然而抗战的号角，却把全体的作家解放了，把我们吹送到了十字街头，吹送到了前线，吹送到了农村，吹送到了大后方的每一个角落，使他们接触了更广大的天地，得以吸收更丰腴而健全的营养。新的艺术到这时才生了根，旧的艺术到这时才恢复了它的气息，新旧的壁垒到这时也才逐渐的化除了。……象这样由玄虚高蹈走向到切实的现实主义的路，这就鼓励了战时文艺的勃兴，也预兆了中国新文艺的伟大将来。^②

(三)传播媒体的衰落。战争给出版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

①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七月》1939年7月第4集第1期。

② 《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第3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于印刷设备毁于炮火,或从业人员星散,以及交通中断、纸张缺乏,原有发行网络不畅,从而使大部分出版业陷于停顿。在全国文学界久负盛名的《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四大文学刊物,此时也只能被迫出版战时联合刊物《呐喊》(1937年9月5日改名《烽火》)。这一每期只能容纳不足万字的小型刊物,“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①也只能勉力支撑了不足两个月又被迫停刊。在《烽火》停刊后,如适夷所说,在一段时间内,除了胡风办的《七月》外,竟几乎没有一本文艺刊物。新的文化中心陆续建立后,局面虽有所好转,但整个30年代后期,出版业不振的景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文学传播方式——文学刊物的衰落,直接影响着文学体式的变化,从而使作家不得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使“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底主流”。^②

新的文学秩序,孕育着新的文学观、新的文学风貌。文学开始在新的轨迹上运行。

四 审美心理嬗变:文学观念的倾斜

抗战初期,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读者的审美心理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国上下,沸腾着激越的爱国热情;弥漫于全国的守土保乡、一致赴敌的献身精神,成为左右读者审美心理的热点。在和平时期,有着不同审美需要的中国人,此时则表现为在审美心理上的共同性,即审美心理需要总体上的趋时性。战时的审美心理与平时读者正常的审美活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战争无关的审美活动受到了抑制。读者对于文学救亡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的需

① 《本刊启事》,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② 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艺阵地》1938年5月第1卷第2期。

要,明显地减弱了,淡化了。读者新的审美结构的确立,新的审美心理需要的信息,迅速地以多种方式反馈给了作者,从而使作者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创作上进行自我调节,建构新的艺术美,以不断适应、满足读者审美心理的需要。许多作家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亭子间,走进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广阔天地。即使那些平时遨游于艺术之宫的作者,在敌人炮火的驱赶下,此时也被迫背井离乡,迈向充满着血污的呻吟着的陌生土地。

读者审美心理的嬗变,促进着抗日战争初期文学路向的调整,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巨大倾斜。这主要表现为:

(一)**民族意识的张扬**。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民族救亡情绪日益高涨。然而,就文学发展的主导倾向而言,对于国内压迫者的抗争,仍然是左翼作家创作最重要的主题。被强化了了的阶级意识,仍然是许多作家观察生活、选择主题的基本规范。抗日战争开始后,民族意识迅速高扬。作家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心,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对于抗日将士英勇行为的敬佩,对于妨害抗战腐朽力量的警戒和憎恶,溶为一体,磅礴于中华大地。这一创作意识的调整,不取决于某个个人的意志,而是对于全国普遍社会心理的认同。遭受侵略和欺辱的民族,只有寻找到本民族历史的闪光点,确立新的民族自信心,才能在屈辱与自豪感的交汇中,萌生民族再生的凝聚力,获取真正的心理平衡。

民族意识强化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对于群体和力的崇尚。为了凝聚群体,战胜凶恶的敌人,作家视民族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一切,在严峻时刻表达了对于民族的忠诚和深厚的爱。郭沫若说:“我们要牺牲一己之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之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①巴金说:

^① 转引自《全国文艺界空前团结》,载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

“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① 一些优秀作品，熔铸着全民族奋起抗争的排山倒海之力和雄伟壮美的阳刚之气，有着狂风疾驰的旋律。古老黄河的怒吼，化为亿万民众惊天动地的呼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象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莽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做成我们民族的屏障！”《黄河大合唱》这气吞山河的歌词，谱写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曲。

对于英雄的渴望，是强化民族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支点。处于民族危亡之秋，许多作家把目光集中于对现实和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创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雄的行为集中体现着群体的意志，愿望，情绪，英雄的业绩又是鼓舞群体抗敌的强大动力。在《烽火》上，我们看到了上海驻军在“八·一三”抗战中的侧影；《七月》创刊号，就开辟有“抗战英雄特写”专栏；在《抗战文艺》上，经常出现着类似《五十七条好汉》、《台庄一勇士》、《江晓凤舍身诱敌》一类题目；而歌颂八路军将士的通讯、特写，更占据了解放区文艺刊物的大部分篇幅。在一些以抒写人民苦难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中，有时也潜藏着深沉的民族意识，透露出一种悲壮的民族再生之力。

当然，在张扬民族意识的旗帜下，当时人们对民族意识的理解，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有人就认为，强化民族意识“就国家民族言亦必要求国民全体之思想绝对统一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② 这一理解，和以动员民众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为真谛的民族意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鼓吹这种带有浓重专制色彩的“民族意识”，最终会构成对于民族意识的压抑和限制。

① 《一点感想》，1937年《呐喊》创刊号。

② 张道藩：《四年来之文化动向》，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抗战四年》。